

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 来自欧洲的证据和启示

丁 纯

[摘 要] 为研究社会保障是否必定拖累经济发展，本文首先选取欧洲由“福利国家”向“竞争国家”转型时期，以欧洲社保四大子模式代表国家瑞典、德国、英国和希腊为分析对象，从社会保障对长期经济宏观运行、消费、劳动力市场、科技创新、财政负担的影响以及社保水平与经济发展适应性等角度逐一分析研判；接着，对欧盟全体成员国（含英国）社会保障与经济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保障有利于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刺激消费、促进就业、提升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能力，其一定拖累经济发展的结论未得到支持。最后，提出了对中国社保发展的启示：立足国情，社保与经济发展相互适应，顺应时代对社保的要求，强化社保对人力资本的增能作用，避免重蹈欧洲国家泛福利化的弯路。

[关键词] 经济增长；社会保障；欧盟国家；适应性；实证分析

一、引言

作为社会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工业化的衍生产物，其要解决的与农耕社会要解决的贫困和社保问题有着根本不同。^①从生产力视角，工业化机器大生产为其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从生产关系视角，工业化的后果也使原本在人生可能遭遇各种风险时，如年老、疾病、工伤、失业、失能或陷入绝对贫困之际，借由家庭、血缘关系来提供救助的方式难以维系，从而需要国家或社会负责的专门制度安排。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学实质是社会再分配，是一种不同于初次分配，即不是完全由人的经济理性自发、（商品）市场法则决定的，而是在一国民众对基本人权的认知和社会保障待遇达到一定共识基础上，形成相关的法律、法规，并加以强制实施的社会制度安排。从社会保障制度诞生之日起，其与经济、经济制度之间的关系就始终是决策者、学界和坊间民众广为关注和反复争论的热点话题。一方面，其促进再分配，降低、消弭“社会排斥”和社会对抗，从而熨平经济大幅波动，发挥减少紊乱的避震功能，

[作者简介] 丁纯，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世界经济、世界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作者感谢高雨虹、李嫦在本文写作中提供的帮助和贡献。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20VGQ012）。

^① 周弘：《福利的解析——来自欧美的启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186页。

维持经济长期和温和增长,这些贡献有目共睹、广受认可。另一方面,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且拖累经济发展等观点也甚嚣尘上。二战以后,与福利国家相伴的“福利病”“养懒人”等现象广受指责和诟病。近年来,尤其是欧债危机以来,在老龄化、全球化、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化冲击下,有关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的争议又再度引发广泛的讨论和研究。^①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福利制度触发经济衰退,抑制生产力;也有经济学家持相反观点,认为社会不平等导致经济危机,而福利制度可以纠正不平等,缓解经济危机。^②

有鉴于此,我们以人类历史上最先进入工业社会、最早诞生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国家安排、社会保障模式形态最为丰富、最早步入老龄化时代,且是全球化、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化的推动和经历者的欧洲(盟)国家为考察对象,特别聚焦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最初20年里,也即欧洲社保力改此前福利制度沉疴、实现从“福利国家”到“竞争国家”转换的新阶段。本文以欧洲社会保障制度四大子模式的代表国家瑞典、德国、英国和希腊为分析对象,条分缕析社会保障对长期经济运行、消费、劳动力、技术创新、财政负担等要素的影响,以及社保与经济发展适度水平关系等;并运用实证分析方法,以欧盟全体成员国(含英国)为研究对象,就其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严谨的研判,以便较为全面和可信地回应“社会保障是否拖累经济发展”这一恒久的疑问和命题。

二、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视角下的欧洲社保发展沿革和主要社保模式

(一) 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互动视角下的欧洲社会保障发展沿革

欧洲是现代工业革命的起源地,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萌芽和正式诞生是和工业化进程直接关联的。欧洲社保领域较早的标志性事件可上溯到16、17世纪,处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期的英国分别于1601年和1834年颁布了《济贫法》以及《济贫法修正案》。当时这些带有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萌芽特征的转型期的社会法案,无疑有助于工业化前期“圈地运动”阶段所产生的乞丐、流浪者、城市游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等人群的贫困救济和安置,有助于社会矛盾的缓解、工业化的推进和工人阶级的形成、现代工业社会奠基和生产力的提升、城镇化的加速、经济阶段的跃迁性发展、社会形态的适应性转型。德意志帝国俾斯麦时期,作为工业化后来者的德国,一方面正在经历内部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对外经普法战争争夺欧洲霸权,另一方面则也处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严酷的自由竞争阶段,工作条件和劳动环境异常恶劣,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下的工人运动蓬勃展开,劳资矛盾和冲突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威胁。俾斯麦政府在镇压工人运动失败后,改弦更张,吸收德国新历史学派的改良主张,用现代社保制度来缓和阶级矛盾和劳资冲突,以图釜底抽薪。德国于1883、1884和1889年分别颁布了《工人疾病社会保险法》《工伤事故保险法》《老年与残疾社会保险法》等,创建了首

① 郑功成、沃尔夫冈·舒尔茨:《全球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回顾与展望》,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9年,第3页。

② Federico Cingano, "Trends in Income Inequality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OECD Social,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Working Papers*, No.163, 2014.

个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险制度，该制度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加速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以 1942 年《贝弗里奇报告》提出的“社会成员全覆盖、政府统一管理和全面保障”三项原则为主旨，英国于 1948 年 7 月创立全球首个“福利国家”，实施“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社会保障计划；在二战之后世界经济黄金时代的经济持续增长的支撑及东、西方对峙和全面竞争的刺激下，以福利国家为代表的社保制度在欧洲经历了空前发展，甚至在北欧出现了“泛福利化”的现象；20 世纪 70 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及其后续衍生的“滞胀”使刚性增长的社保待遇遭遇了入不敷出的尴尬，也使人们开始了对慷慨的社保制度“养懒人”的反思和指责。以英国撒切尔夫人实施的对英国全民医疗服务（NHS）制度的内部市场（internal market）改革^①为标志，欧洲福利国家纷纷着手改革以解决社保收支缺口、社保增长超越经济增长的问题，强调国家（社会）、雇主和个人的权利义务平衡；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欧洲社保制度面临着老龄化、以资本自由流动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冲击。欧洲社会老龄化程度全球居前，以现收现付制为主体的筹资模式深受冲击。以“地球是平的”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使竞争空前激烈，科技竞争成为博弈焦点，国家间社会倾销的压力陡增，压缩社保福利、减降人工成本再度成为“生存法则”，^②这一趋势在欧债危机后外溢明显。欧洲社保制度的目标定位也发生了从“福利国家”到“竞争国家”的转变，北欧和莱茵模式的瑞典、德国等国均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社保改革。但随着全球化造成的欧洲社会贫富差距加大，以“黄背心”运动为标志、民众要求更加公平的“社会欧洲”的反作用力日增，欧洲社保制度在夹缝中“参数化”改革的趋势日益盛行。^③同时，随着数字化、人工智能等为特征的新经济时代到来，面对平台经济、零工经济等带来的就业方式多样化，全民基本收入计划^④等设想和尝试又成为欧洲社保适应性改革的探索方向。细观欧洲社保发展沿革历史，就是一部社保和经济发展相互适应的历史。

（二）欧洲主要社会保障模式及代表国家的社保绩效

随着时代的推移，欧洲国家作为现代社会保障的先驱，逐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子模式。艾斯平-安德森在其著名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中以“非商品化”与社会权利等为划分标准，创造性地将资本主义福利制度分为三种模式，即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自由主义模式、欧洲大陆国家的保守主义模式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形式。^⑤此后，又有学者如 Stephan Leibfried 等在此分类基础上加入拉丁化模式，亦称南欧或地中海模式。^⑥

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自由主义社会保障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强调市场作用、较高就业率、较高工资差异，主要救助对象为低收入群体，实行少量普遍性转移支

① 丁纯：《世界主要医疗保障制度模式绩效比较》（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67-175 页。

② Chun Ding, "The Complex Social Side of Globalization" in Mario Telò, *Globalization, Multilateralism Europe*, Routledge, 2016.

③ 郑功成、沃尔夫冈·舒尔茨：《全球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回顾与展望》，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9 年，第 230-238 页；周弘：《欧洲国家公共养老金改革的路径选择：结构还是参数？》，《欧洲研究》2017 年第 5 期。

④ 赵柯、李刚：《资本主义制度再平衡：全民基本收入的理念与实践》，《欧洲研究》2019 年第 1 期。

⑤ Gösta Esping-Andersen,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6-27.

⑥ 按照 Stephan Leibfried 的分类，拉丁或南欧模式也包括法国模式。参见 Stephan Leibfried, "Towards a European Welfare State?" in Catherine Johns(e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Welfare State in Europe*, Routledge, 1993.

付与社会保险相结合的方式,非商品化效应最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欧洲的代表国家是英国、爱尔兰等英联邦体制国家。欧洲大陆的保守合作主义模式(又称俾斯麦或莱茵模式、欧洲大陆模式)以权利义务相一致为特征,强调合作主义以及权利和义务的对等,个人的工作与参保年限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退休后所获得的社会保障水平,非商品化程度较高,代表国家主要为欧洲大陆国家如德国、法国、奥地利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又称北欧模式或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以通过高税收筹资、待遇高、全覆盖为主要特征。北欧模式接受了贝弗里奇的普遍公民权原则,社会保障权利主要取决于公民资格而非个人需求或工作表现,非商品化程度最高,代表国家为瑞典、芬兰、丹麦等北欧国家。南欧模式(又称地中海模式)的特征是依靠家庭提供保障,社会福利水平和覆盖面水平相对较低,社保制度起步较晚,注重养老,非商品化程度较低,代表国家主要包括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南欧诸国。欧洲社会保障四大子模式的特征归纳见表1。

表1 欧洲社会保障四大子模式特征

社会保障模式	北欧模式	莱茵模式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南欧模式
体制类型	现代福利国家	制度福利国家	剩余福利国家	基础福利国家
国家作用	强	中	弱	弱
市场作用	弱	中	强	中
家庭作用	弱	强	中	强
社保覆盖率	高	中	中	低
非商品化水平	高	中	低	低
社会权利	高	中	低	低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①江燕娟《社会福利三种模式的比较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②刘珊《福利模式的全景式比较研究——〈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的启示》、^③郑秉文《“福利模式”比较研究与福利改革实证分析》^④等整理。

为了便于归纳和分析,基于上述分类标准,本文以瑞典(北欧模式)、德国(莱茵模式)、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与希腊(南欧模式)为四种社保模式的代表国家,就其社保绩效以及社保与经济的关系进行案例分析。

为了对瑞典、德国、英国和希腊的社会保障模式自21世纪以来尤其是欧债危机前后的绩效变化进行简要的评价,我们参考André Sapir^⑤的做法,用欧洲15国的数据,通过对社保体制的公平性(以1-贫困率表示)和效率(以就业率表示)的组合的查验,评判其绩效及其变动。

① Gösta Esping-Andersen,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6-27.

② 江燕娟:《社会福利三种模式的比较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社会福利(理论版)》2013年第8期。

③ 刘珊:《福利模式的全景式比较研究——〈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的启示》,《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④ 郑秉文:《“福利模式”比较研究与福利改革实证分析》,《学术界》2005年第3期。

⑤ André Sapir,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form of European Social Models," *JCM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2006, 44(2). 该方法的衡量指标尽管较为简单、不够全面精准,但能较为直观地反映两者间的组合关系和年度实际变化情况。

我们先选取 2006 年欧洲各国社保制度的效率和公平性组合的情况，考察欧债危机爆发前社保制度绩效情形（见图 1）。可以发现：一般来讲，以瑞典领衔的北欧模式国家的社保绩效呈现出高公平性和高效率的双高特征；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模式表现为较高公平性和较高效率的双次高特点；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英国则表现为较低公平性和高效率的组合；而作为南欧模式代表的希腊则明显是低公平性和低效率的双低组合的典型（见表 2）。

经过欧债危机，在老龄化、全球化、民粹主义、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化的冲击下，欧洲各国社保模式及其典型国家的社保和经济运行情况发生了嬗变。我们以新冠疫情暴发前的 2017 年为例，观察其动态变化情况（见图 2）。与 2006 年欧洲各社保子模式的表现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特点：其一，欧盟国家整体平均的社保效率有所提高，公平性有所下降。这很大程度上应该是由欧债危机衍生的社会贫困和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全球化、老龄化压力下的财政紧缩、福利削减，以及各国针对劳动力市场的积极改革等所致。这表明了社保制度适应全球化经济发展的情况和趋势。其二，德国社保公平性略有下滑，但效率提升明显，整体跻身最优的双高组合之中，颇为引人注目。这主要应该归功于由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所倡导和推进的、以劳动力市场“哈尔茨改革”为代表的，并包含养老、医疗和劳动力市场政策等的“2010 议程”改革。这场未雨绸缪的改革，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德国经济此后在欧洲一枝独秀的表现，而后者反过来支持了社保的可持续发展。其三，瑞典的绩效基本维持在原先组合区域，在效率指标提升的情况下，其社保体制的公平性有所下降，反映了其削减原先“泛福利化”的改革成果。其四，英国社保在维持较高效率和较低公平性组合格局下，体制的公平性和效率均略有上扬，说明其社保制度改革在适应经济发展方面是有所成效的。其五，希腊总体绩效仍在原区域，在社保体制的公平性略有上升的情况下，效率稍有下跌（见表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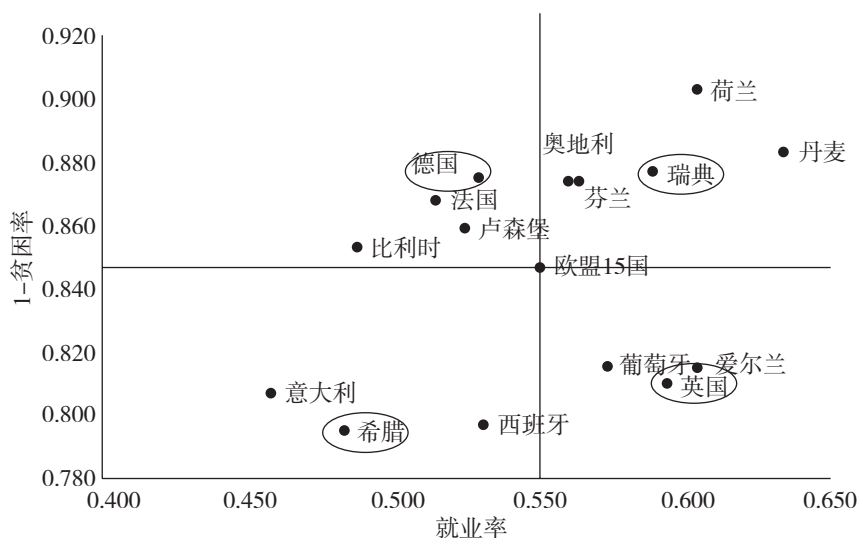


图 1 2006 年欧洲 15 国社保体制绩效（就业率与非贫困率组合）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的就业率数据（<https://data.worldbank.org.cn/>）和欧盟统计局的贫困率数据（<https://ec.europa.eu/eurostat/portal/page/portal/eurostat/home>）计算所得。

表 2 欧洲四大社保子模式的体制绩效

	2006 年		2017 年	
社保模式代表国家	社保效率	社保公平性	社保效率	社保公平性
北欧模式 瑞典	+	+	+	+
莱茵模式 德国	-	+	+	+
盎格鲁 - 撒克逊模式 英国	+	-	+	-
南欧模式 希腊	-	-	-	-

注：“+”表示高于欧盟平均水平，“-”表示低于欧盟平均水平。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欧盟统计局和世界银行数据归纳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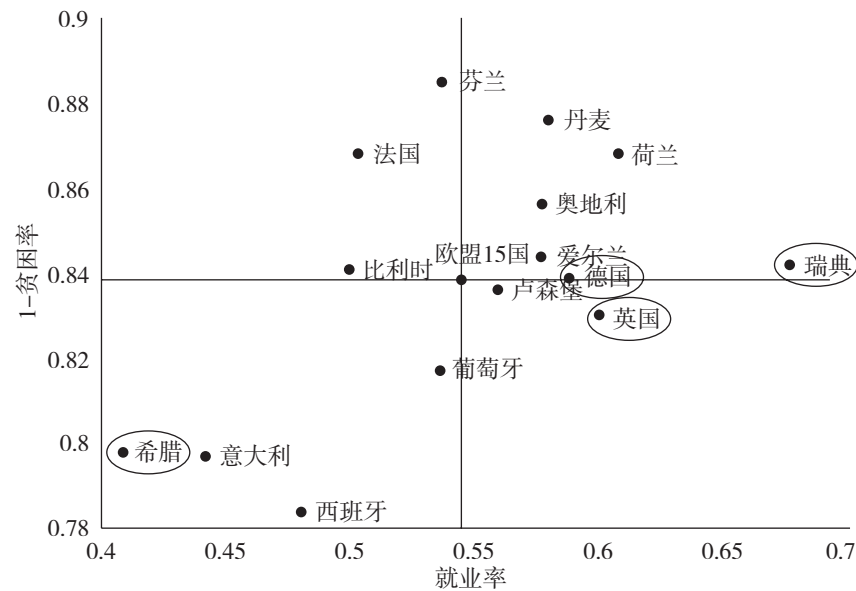


图 2 2017 年欧洲 15 国社保体制绩效（就业率与非贫困率组合）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的就业率数据（<https://data.worldbank.org.cn/>）和欧盟统计局的贫困率数据（<https://ec.europa.eu/eurostat/portal/page/portal/eurostat/home>）计算所得。

三、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欧洲社保主要模式代表国家的实例分析

对于“社会保障是否拖累了经济发展”这一命题，本文主要从社会保障对总体宏观经济长期运行的影响和社会保障对消费、劳动力（市场）、技术创新、财政负担等具体宏观经济要素的影响，以及社保体制与经济适应性等方面入手，以北欧模式、莱茵模式、盎格鲁 - 撒克逊模式和南欧模式的代表国家瑞典、德国、英国和希腊为研究对象，进行案例分析，以便得出初步结论。

（一）社会保障和长期宏观经济运行发展

社会保障可以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社会摩擦和排斥，熨平大的经济起落，有利于宏观经济长期、稳健运行。按照传统经济学原理，一方面，短期来看，凭借市场竞争可以促进经济效率提高、推动经济增长，而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再分配手段，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竞争的烈度，看似拉低

了经济竞争效率，甚或一定程度导致经济增长率略有降低，从而使人得出社会保障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但另一方面，激烈的竞争在提升经济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带来了社会首次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社会排斥程度加剧，导致社会不安定，衍生经济紊乱乃至阶段性衰退的后果，进而影响经济长期持续的稳健增长趋势。而社会保障作为二次分配的制度安排，可以均衡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和收入不平等，^①降低社会摩擦和排斥，长期和动态来看，可充当长期经济增长的稳定器，提高人力资本与劳动生产力，无疑对避免宏观经济大起大落、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维护长期平稳持续增长起到了保驾护航的积极作用。^②

依据上述定性分析逻辑，我们较为简单和直观地来考察和比较瑞典、德国、英国和希腊的社会保障和长期宏观经济的运行表现及其相互关系。我们选取 1995 年至 2020 年间数据（见表 3），经计算得到，期间社保支出占 GDP 比重的年平均数，瑞典、德国、英国和希腊依次为 27.0%、25.7%、19.8% 和 21.4%；^③ 四国社保的覆盖率，2018 年分别达到 100%、100%、92.1%、63.8%。^④ 显然，瑞典、德国的社会保障的支出和表现总体要好于英国和希腊；而较为完善的社保制度通过再分配效应，无疑会减少社会阶层的贫富差距，这从反映社会贫富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上可以充分地得到展现。该阶段期间，四国年均基尼系数的平均值由低到高分别是瑞典、德国、希腊和英国，依次为 0.28、0.30、0.34 和 0.35。^⑤ 这表明瑞典和德国的贫富差距等社会不公平程度较希腊和英国明显要低（见图 3），从而有效地减轻了社会排斥，缓解了社会冲突，有利于经济的平稳增长。具体可以用每千工人因罢工和停工未工作的损失天数来做比较，从表 4 数据可知，瑞典和德国经过社保体系的有效避震，其因罢工和停工而未工作的天数远远少于英国和希腊。

表 3 1995—2020 年瑞典、德国、英国、希腊相关经济、社会指标数值

国家	社保支出占 GDP 比重年平均值（%）	基尼系数年均值	人均 GDP 年平均增长率（%）	年人均 GDP 增长率方差
瑞典	27.01	0.28	1.70	5.78
德国	25.70	0.30	1.11	5.23
英国	19.77	0.35	1.09	7.24
希腊	21.36	0.34	0.47	17.45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得到；人均 GDP 年增长率、基尼系数数据来自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cn/>），社保支出占 GDP 比重的数据来自经合组织（<https://data.oecd.org/>）。

本文先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一反映经济增长的最典型指标对四国进行比对，同时创新

① Rudolf Traub-Merz 认为，收入不平等涉及道德（有关人权）、政治（有关社会安定）以及主导性的经济（有关激励努力工作）层面的问题。参见 Rudolf Traub-Merz(ed.), *Redistribution for Growth?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Recovery*, Friedrich-Ebert-Stiftung, Shanghai, 2012.

② 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以税收为基础的可持续社会保障或其他通行的社会保障模式是提高生产率和促进向正规经济过渡的关键。参见 ILO, *Conclusions Concerning the Promotion of Sustainable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 2007. 另根据一项研究，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积累（特别是人力资本）水平，而面临分配冲突的国家无法很好的保护与监管产权，不利于资本的积累与增长。参见 Alberto Alesina, Dani Rodrik, "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 109(2).

③ 根据经合组织数据计算所得。

④ 国际劳工组织数据。

⑤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所得。

性地引入经济增长率方差这一指标以反映经济长期平稳运行的程度。^①从经济平均增长率来看,瑞典、德国、英国和希腊四国依次为 1.7%、1.11%、1.09% 和 0.47%,即瑞典最高、希腊最低。最值得注意的是,从 1995 到 2020 年间,瑞典、德国、英国和希腊经济增长率的方差分别为 5.78、5.23、7.24 和 17.45,即德国和瑞典的经济波动程度较小,而希腊和美国呈现较大波动。^②这些均验证了前述的理论定性分析的推论,即具有较好的社会保障的国家通过再分配,可以降低社会分配差距,降低社会冲突烈度,减轻经济衰退(危机)波动冲击,实现宏观经济长期较为平稳的运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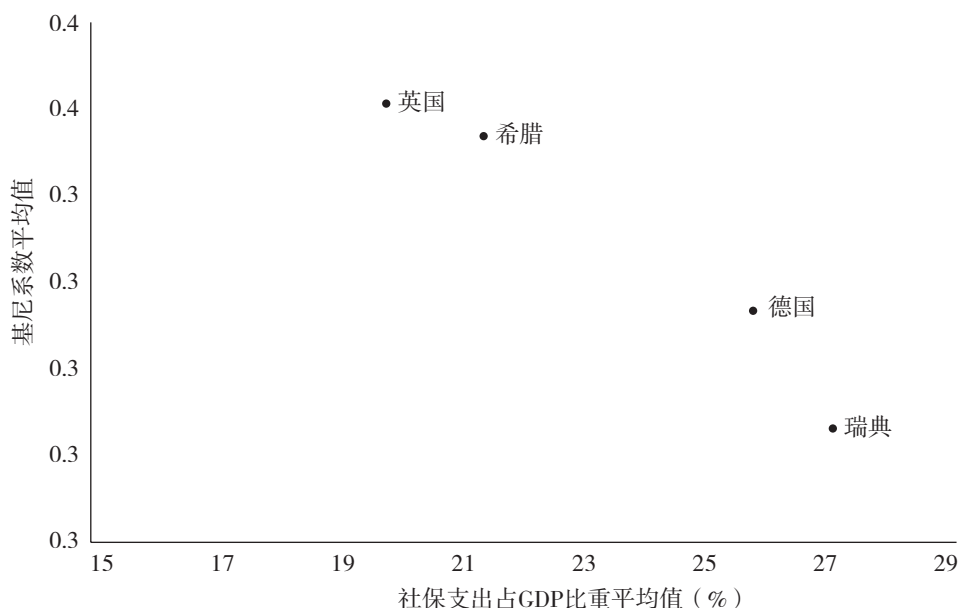


图3 1995—2020年瑞典、德国、英国、希腊社保支出和基尼系数关系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https://data.worldbank.org.cn/>)计算所得。

表4 2001—2019年瑞典、德国、英国、希腊平均因罢工和停工而未工作的天数(每千名工人)

国家	2001—2019年平均因罢工和停工而未工作的天数
瑞典	2.1
德国	6.2
英国	44.4
西班牙	75.0

数据来源:作者依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https://ilostat.ilo.org/data/>)计算所得,由于希腊数据缺失而改由同为南欧模式的西班牙代替。

我们可用图4来直观地展示四国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长期增长)的关系,纵轴代表生产发展(人均GDP的增长率平均值),横轴代表社会保障的投入(社保支出占GDP比重平均值),分别使用两者在1995至2020年间的平均值。结论显而易见:在瑞、德、英、希四国中,在近25年中,具有最高和次高社保支出率的瑞典和德国同时具有最好和次好的经济增长表现;同期,社保支出

① 方差越大,则说明经济增长率的离散和波动程度越大,越小则约平稳。

②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计算所得。

率次低的希腊有着四国中最低的经济增速；而社保支出率最低的英国，其平均经济增速排名第三。如将社保支出比率和经济增长率间关系简单视为一种投入－产出式的演绎，则瑞典和德国案例属于正常的高（次高）投入、高（次高）产出；英国和希腊情形则正好是性价比一优一劣的对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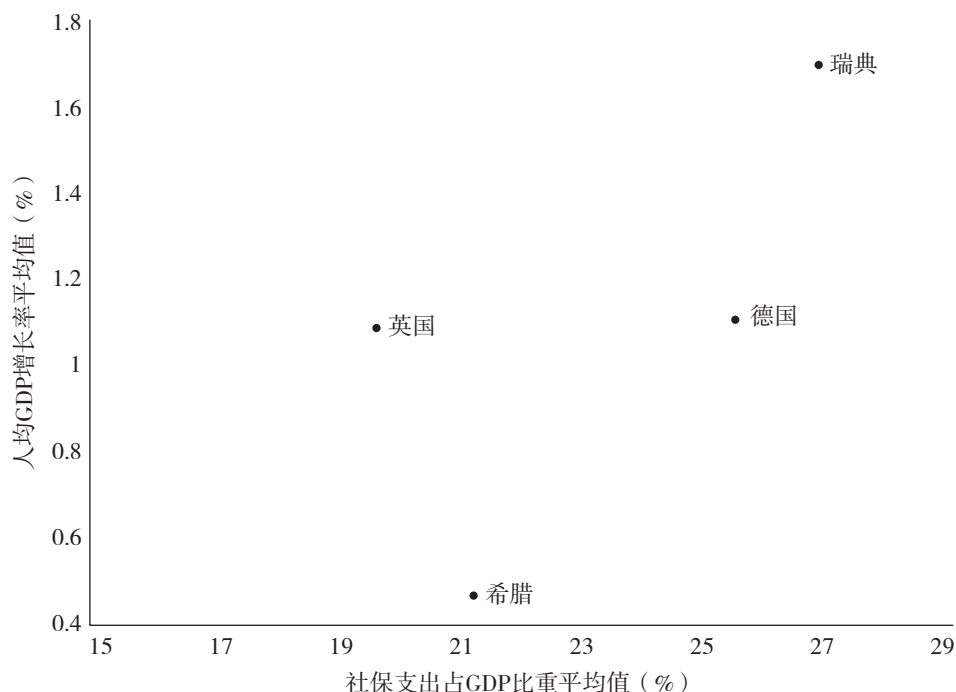


图4 1995—2020年瑞典、德国、英国、希腊社保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人均GDP增长率数据（<https://data.worldbank.org.cn/>）、经合组织社保支出占GDP比重数据（<https://data.oecd.org/>）计算所得。

（二）社会保障和消费

社会保障作为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有助于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在短期增加当期消费，在长期可以平滑消费曲线。学术界有关社会保障与消费关系的研究由来已久，^①结论似莫衷一是，分别有正向、负向和中性三种判断。^②包括凯恩斯、杜森贝利、弗里德曼、费尔德斯坦等学者在内的主流观点认为，社会保障对消费具有正向影响，即促进了消费的增长。相对于高收入群体，低收入和贫困人群为了基本生存的需要，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社会保障通过收入再分配功能提高了低收入和贫困人群的可支配收入，根据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贫困人口增加的可支配收入可迅速转换为消费支出，即社保再分配使得收入从低消费倾向群体向高消费倾向群体转移，提高社会整体消费水平。杜森贝利虽反对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指出消费取决于居民的相对收入而非绝对收入，但提出了消费的示范效应

① 自戴蒙德(Diamond)1965年分析国债与社会保障依赖关系开始，学术界研讨社会保障如何影响消费、储蓄和资本积累渐多，该命题现已成为社保政策辩论的中心议题。

② 亦有学者认为社保对消费影响是负向的：Thaler认为居民更倾向当期消费获得的即时快乐，现期消费倾向大于远期消费倾向。社保使得现期收入转化为未来收入，减少当前消费。Gale依据生命周期理论认为社保缴费减少当期收入，现期收入消费倾向高于远期收入消费倾向，当期消费减少。还有学者如Barro认为社保对消费的影响是中性的：居民存在遗赠动机，社保会增加储蓄，对消费无影响，社保短期平滑消费，但是长期中作用会消失。可参阅Robert J. Barro, "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 106(2).

和棘轮效应,认为消费习惯具有不可逆性,且低收入者的消费具有对高收入者的模仿性,社会保障通过再分配缩小社会收入差距,促使居民整体消费水平的上升。根据生命周期理论,社保为退休后生活提供保障,刺激当前消费,并平滑总体消费支出。弗里德曼认为,社保减少不确定性,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加总体消费水平。^①也有学者认为社会保障可提高居民消费倾向,从而提高消费支出,如费尔德斯坦认为社会保障在整体上抑制了私人储蓄、促进了消费。^②

具体地,我们来观察瑞典、德国、英国和希腊在1995—2020年期间居民消费支出方面的演化模式。从总体表现看(见表5),英国和瑞典的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较高,特别是四国中社保支出占GDP比重最高的瑞典的平均消费增长率(1.74%)达到希腊(0.83%)同期数据的2倍多。比较令人诧异的是,虽然英国社保支出率并不高,但居民消费增长率略超过瑞典,这可能部分源于英国居民消费结构中住房消费占据较大比重,且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干预较少,房产价格一直呈稳步上升趋势。据CEIC数据库英国房价指数可得,2016年的房价指数是2002年房价指数的3倍,除金融危机期间房价略有下跌,其他年份均持续上升。同时,以居民消费的另一指标人均消费支出来看,1995—2020年间四国人均消费支出的平均值由高到低分别为瑞典(32861美元)、英国(32161美元)、德国(27710美元)和希腊(17391美元)。^③这一指标的四国对比与消费增长率基本趋同,瑞典和英国整体消费水平最高,其次为德国,而希腊的消费水平最低。这些数据对比一定程度验证了社保对消费影响的理论分析,即社会保障的发展可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可支配收入,同时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需求,推动社会整体消费水平的上升。

表5 1995—2020年瑞典、德国、英国、希腊消费支出增长率(%)

国家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1995—2020 平均值
瑞典	0.74	3.26	2.13	3.16	3.30	-3.44	1.74
德国	1.71	1.65	0.72	0.90	2.20	-3.22	1.06
英国	1.96	4.13	2.52	1.31	3.06	-9.51	1.86
希腊	3.04	2.76	3.43	-5.92	0.35	-5.50	0.83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https://data.worldbank.org/cn/>)整理计算所得。受限于篇幅,此处仅展示每五年数据,平均值为1995—2020年每年增长率计算所得。

(三) 社会保障和就业

社会保障有增加劳动力市场就业数量以及提高劳动力质量等积极影响,当然过度的社会保障待遇和“泛福利化”可能滋生“福利依赖”“养懒汉”等消极现象。社会保障对就业的积极影响机制包括:其一,适度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帮助劳动者有效抵御疾病、失业、工伤和老年等各类社会风险,降低贫困的发生,有利于劳动力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④还能减少摩

① 郭希宇:《财政社会保障水平对我国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城镇化门槛效应的视角》,重庆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

② 费尔德斯坦同时又指出社会保障对私人消费和储蓄的净影响取决于“财富替代效应”与“引致退休效应”的相对强度。参见 Martin Feldstein, "Social Security, Induced Retirement, and Aggregate Capital Forma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4, 82(5).

③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https://data.worldbank.org/cn/>)整理计算所得。

④ 夏正荣:《浅析我国人力资源劳动就业及社会保障关系》,《就业与保障》2021年第6期;范仲文、黄萍:《论社会保障与劳动就业的关系》,《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3期。

擦性失业，增加再就业，扩大灵活就业、自主创业等，增加劳动力供给；其二，社会保障通过财富再分配和社会避震器的作用，促进了经济长期、平稳增长，扩张了劳动力需求，同时，现代社会保障领域和项目的不断扩展如引入长期护理保险等，也扩大了就业的需求，提供了新增就业岗位；^①其三，社会保障尤其是其中的失业保险、积极劳动力政策、家庭政策、生育及教育政策与福利津贴等还增进了劳动者和潜在劳动者的基础教育、职业培训机会，有力地提升了劳动者尤其是女性、年轻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也即提供了高质量且与现代经济发展相符的劳动力供给，降低了结构性失业，增加了就业，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了经济结构升级和社会发展。社会保障对就业的消极影响机制包括：过高的社会保障待遇（尤其是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会激发人们的道德风险，即当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待遇水平过高的失业或者贫困救济时，人们宁愿选择不就业或主观上不积极地寻找就业岗位；或者相应的养老保障待遇较高，人们宁愿放弃全额法定退休金，选择不到法定年龄就提前退休等，从而滋生所谓的“养懒人”现象。此外，这些消极影响不仅会造成劳动力市场效率低下，而且也推动资金流入资本密集型行业，改变产业结构，减少国民经济对劳动力的整体需求。

在此，我们选取 15 岁以上人口就业率作为观测指标，考察 1995 至 2020 年期间瑞典、德国、英国和希腊的劳动力市场表现演化，可以清晰地发现，除希腊外，其余三国该指标大体呈现出波动且略有上升的态势（见图 5）。显然，尽管模式不一，但总体而言，随着社保制度的发展、改革和完善，其有力地推动了各国就业率的增长；目前瑞典以 67% 的就业率独占鳌头，希腊垫底。四国该指标的年平均值按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瑞典（61.8%）、英国（58.6%）、德国（54.9%）和希腊（44.4%），^②大体与各自社保制度的表现优劣相符。这说明越完善的社保体系和越高的社会投资（包括在医疗卫生、儿童与家庭福利、职业培训与教育等方面的投入），能带来越高的就业率和越好的劳动力市场表现。进一步细究各国就业率缓步波动上升的成因，贡献最大的无疑是期间女性就业率的提升（见图 6）。瑞典女性就业率以 64.56% 雄踞榜首，恰好是北欧国家长期以来不断完善和实施妇女、家庭友好型及注重社会投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政策的集中体现。^③

同时，四国劳动力市场的表现还折射出社保制度对劳动力质量和人力资本提升的作用。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欧盟就逐步将以就业参与、人力资本培育为核心的社会投资政策体现在社保和劳动力政策中，尽可能将投资用于人力资本而非经济资助。欧洲社保政策改革的人力资本投资转向，同样说明了社会保障对于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所起到的积极作用。^④瑞典等北欧国家在社会投资上拔得头筹，免费高等教育成为其高强度人力资本投资的标志；德国《联邦教育促进法》《联邦劳动促进法》和闻名遐迩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等均为其高质量劳动力的供给奠定了基础。25—64 岁完成高中教育的人群是劳动力市场的中坚力量，该指标的四国比较也基本反映了人力资本水平的总体情况及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投资的绩效（见表 6）。德国 1995—

① 在瑞典，长期护理工作者占全部工作人口的 3.6%，见《2016 年中欧社会保障改革高级别会议之课题研究报告》，中国—欧盟社会保障改革项目，2016 年 6 月。

②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 (<https://data.worldbank.org/cn/>) 计算所得。

③ 斯坦恩·库恩勒、陈寅章等：《北欧福利国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96-211 页、第 212-235 页。

④ 参见 Anthony Giddens,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John Wiley & Sons, 2013.

2020年25—64岁人口高中文凭占比的平均值为58.9%，居四国之首，德国高素质的劳动力为其享誉世界的四大支柱产业——汽车、化工、电子和机械制造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作为南欧模式代表国家的希腊近年来改弦更张，正在疾速追赶，该指标上升势头明显。^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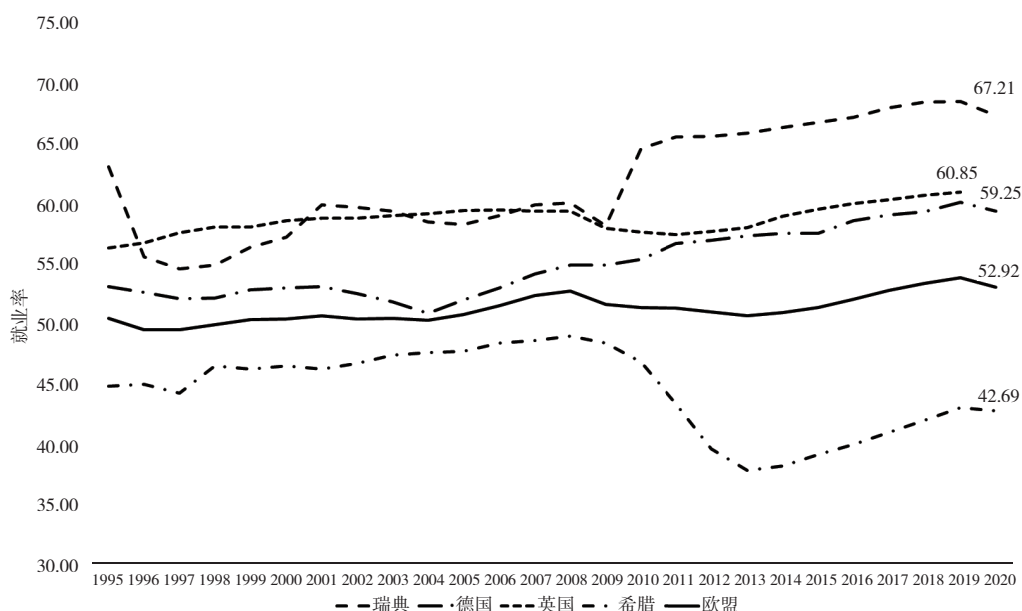


图5 1995—2020年瑞典、德国、英国、希腊与欧盟15岁以上人口就业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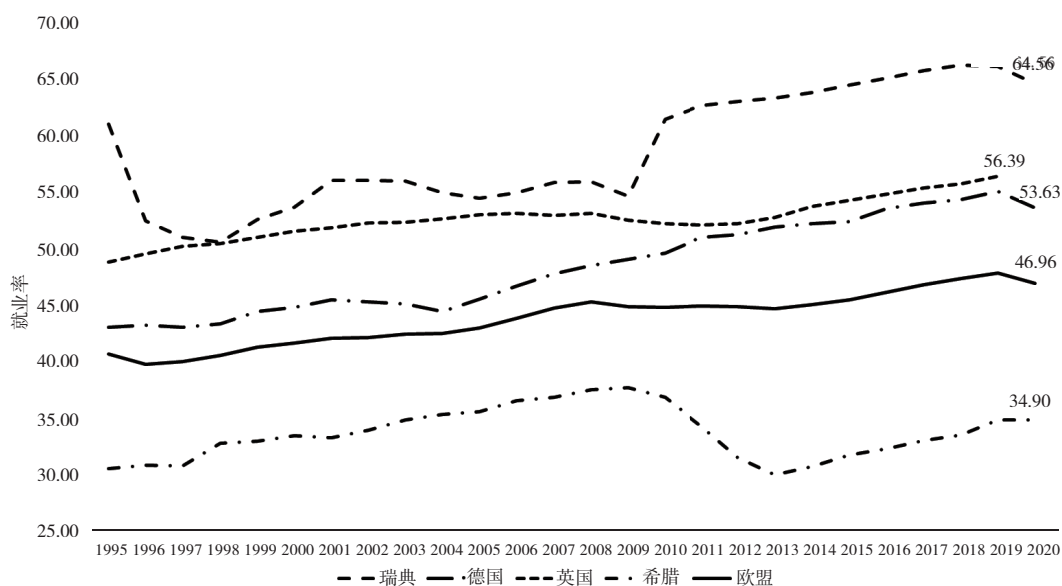


图6 1995—2020年瑞典、德国、英国、希腊与欧盟15岁以上女性人口就业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cn/>。

^① OECD数据显示，四国中，2020年希腊预期受教育年限已经达到17.9年，仅次于瑞典的19.5年，不仅高于欧盟平均16.9年，而且也高于德国的17年、英国的17.5年。

表 6 1995—2020 年瑞典、德国、英国、希腊 25—64 岁人口高中文凭占比（%）

国家	1995	2000	2005	2010	2016	2020	1995—2020 平均值
瑞典	46.3	47.4	54.0	52.4	41.6	39.3	48.0
德国	61.1	58.2	58.6	59.2	58.2	54.9	58.9
英国	无数据	36.9	37.1	36.9	35.0	32.1	36.2
希腊	28.3	31.6	36.2	38.0	41.4	43.7	36.3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经合组织数据（<https://data.oecd.org/>）计算所得。受限于篇幅，此处仅展示每五年数据，2015 年数据缺失故展示 2016 年数据，平均值为 1995—2020 年每年增长率计算所得。

接着，我们仍以四国劳动力市场 1995 至 2020 年间的表现和相关数据为据，研判四国在该阶段的是否存在明显“养懒人”的现象。其一，劳动参与率。按照国际劳工组织有关劳动参与率的定义，该指标是已经就业和积极寻找工作（actively seeking work）的人群占全体就业年龄人口的比重，能较好地反映主观就业意愿。四国 1995 至 2020 年间期间无论是总体还是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平均值（见表 7、图 7）由高到低均依次为瑞典、英国、德国和希腊。社保投入最多、失业和贫困救济慷慨的瑞典，劳动参与率反而最高；社保相对较差的希腊，其劳动参与率也垫底。四国这阶段的情形，似并不充分支持较齐全的社保待遇“养懒人”的指控。其二，长期失业率。该指标是指失业时间一年以上人群占总失业人群的百分比，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主观上缺乏再就业的意愿的程度。我们比较四国该时期的情况可得：瑞典长期失业人群的占比最低，希腊反而最高，具有崇尚竞争氛围的英国位居第二顺理成章，德国则排名第三（见表 8）。德国经过施罗德政府哈尔茨劳动力市场改革，合并了失业和社会救济以及推行了一系列遏制道德风险的改革举措后，该数值呈一路下跌趋势。其三，实际平均退休年龄与法定退休年龄的差额。人们平均的实际退休年龄一般都会低于法定退休年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宁愿领取非全额养老金，提早享受退休生活，因为该提前退休养老金待遇已经足够维持体面的退休生活。我们发现，各国女性和男性实际退休年龄和法定退休差值排序，从小到大分别依次为瑞典、德国、英国和希腊以及瑞典、希腊、英国和德国（见表 9），也不能支持社保待遇“养懒人”的说法。总之，上述三项指标、四国情形说明，不能一概而论说社保完善便“养懒人”，而是取决于具体的劳动力市场制度设计、待遇适度水平等诸多因素。

表 7 1995—2020 年瑞典、德国、英国、希腊与欧盟 15 岁以上人口劳动参与率（%）

国家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1995—2020 平均值
瑞典	63.7	62.4	62.9	63.1	64.0	64.4	63.4
德国	57.7	57.5	58.4	59.4	60.1	61.6	59.1
英国	61.6	62.0	62.3	62.4	62.8	62.9	62.3
希腊	49.2	52.1	52.9	53.5	52.0	51.0	52.0
欧盟	55.6	55.9	56.0	56.7	56.8	56.7	56.3

数据来源：作者依据世界银行数据（<https://data.worldbank.org.cn/>）计算所得。受限于篇幅，此处仅展示每五年数据，平均值为 1995—2020 年间逐年计算所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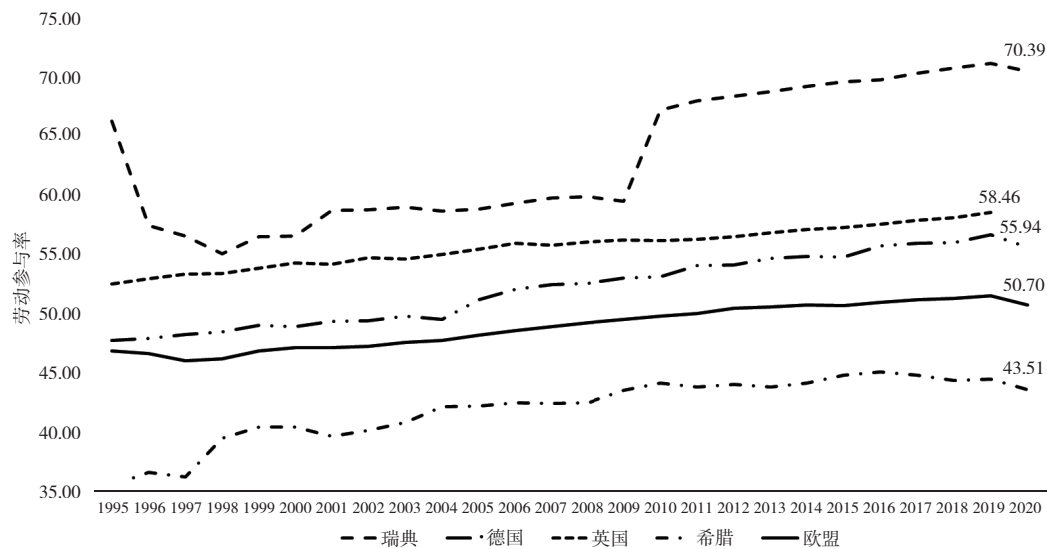


图7 1995—2020年瑞典、德国、英国、希腊与欧盟15岁以上女性劳动参与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cn/>。

表8 1995—2020年瑞典、德国、英国、希腊与欧盟长期失业率(%)

国家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1995—2020 平均值
瑞典	27.8	26.4	无数据	17.3	17.6	11.7	19.8
德国	48.7	51.5	53.0	47.3	44.0	28.7	47.4
英国	43.6	26.7	21.1	32.6	30.7	20.0	28.5
希腊	51.4	54.8	52.0	44.6	73.1	66.7	57.7
欧盟	49.3	47.3	47.2	40.1	49.8	35.7	45.4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https://data.oecd.org/>）计算。受限于篇幅，此处仅展示每五年数据，平均值为1995—2020年间逐年计算所得。

表9 2020年瑞典、德国、英国、希腊与欧盟的平均实际退休年龄和法定退休年龄情况

国家	男性			女性		
	实际	法定	差值	实际	法定	差值
瑞典	65.8	65.0	0.8	64.9	65.0	-0.1
德国	63.1	65.7	-2.5	63.2	65.7	-2.5
英国	63.7	66.0	-2.3	63.2	66.0	-2.8
希腊	60.9	62.0	-1.1	58.1	62.0	-3.9
欧盟	62.6	64.3	-1.7	61.9	63.5	-1.6

数据来源：经合组织，<https://www.oecd-ilibrary.org/finance-and-investment/pensions-at-a-glance-2021-ca401ebd-en>。

（四）社会保障和科技创新

社会保障通过促进社会人力资本积累，^①推动了科技创新和经济的内生和集约型增长，欧

① 一些研究的结论是现收现付制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并不确定。参见彭浩然、申曙光：《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和中国经验》，《世界经济》2007年第10期。

洲国家正适应从“福利国家”到“竞争国家”的新发展范式。^①在经济全球化竞争日益加剧的大背景下，随着以第三次信息化和第四次智能化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的不断推进，内生性技术进步和创新已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推动因素，而内生性技术进步和创新主要依托高水平人力资本的支撑。^②社会保障在高质量人力资本形成、触发和推动科技创新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③其主要的作用机理包括：一是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各类项目安排，尤其是包括教育津贴等在内的各种社会福利举措、不断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以及终身教育等社会投资投入，提高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的积累。一方面，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提供和积累高水平的各类科技创新人才；另一方面，普遍提高劳动力的整体科技、人文素养和技能，适应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应用，造就和培育适应科创引领型的经济增长的合格劳动力。二是社会保障通过提供基本生活保障，降低创新失败的风险后果，为个人创新创业解除后顾之忧，从而鼓励创新活动。^④三是社会保障在为员工提供保障的同时也增加了企业社保的缴费负担，倒逼企业通过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变运行和增长方式。^⑤社会保障进步有助于人力资本不断积累，推动社会内生技术进步，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增长又推动着高水平人力资本不断积累，继续推动技术进步，形成良性循环，经济持续高水平健康增长。

在社保制度助力下，瑞典、德国、英国和希腊四国作为创新基础的人力资本存量得以不断提升，创新氛围等基础框架条件日趋完善。四国人均受教育年限普遍呈不断上升趋势；同时，四国间仍存在明显的差距，排序依次为德国、英国、瑞典和希腊。最高的德国达到 14.2 年，最低的希腊仅为 10.6 年（见表 10）。与之对应，体现人力资本水平的每百万人口中的研发人员数量指标，由高到低排序分别为瑞典、德国、英国和希腊（见图 8）。高水平人力资本，辅之以高强度的科研投入、创新友好型的科创制度安排以及社会氛围，自然激发了高科技创新产出。世界银行公布的四国每百万人口专利申请数量的差异（见图 9），完全印证了本文前述的推理。

表 10 瑞典、德国、英国和希腊人均受教育年限

国家	2005	2010	2015	2020
瑞典	12.3	11.7	12.3	12.5
德国	13.7	12.2	13.2	14.2
英国	无数据	13.2	13.3	13.2
希腊	9.8	10.1	10.5	10.6

数据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http://data.uis.unesco.org>。

① 郑功成、沃尔夫冈·舒尔茨：《全球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回顾与展望》，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9 年，第 230-238 页。

② Luis A. Rivera-Batiz, Paul M. Romer,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Endogenous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 106(2).

③ 沈燕：《社会保障对人力资本及其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中国 1989—2008 年的数据》，《社会保障研究》2012 年第 4 期。

④ 陈宇：《完善社保对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效用研究》，《江汉学术》2014 年第 2 期。

⑤ 程欣、邓大松、叶丹：《更高的社保投入有利于企业创新吗——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实证研究》，《社会保障研究》2019 年第 5 期；王增文：《社会保障与技术进步动态组合的经济发展驱动路径分析》，《科学学研究》2016 年第 9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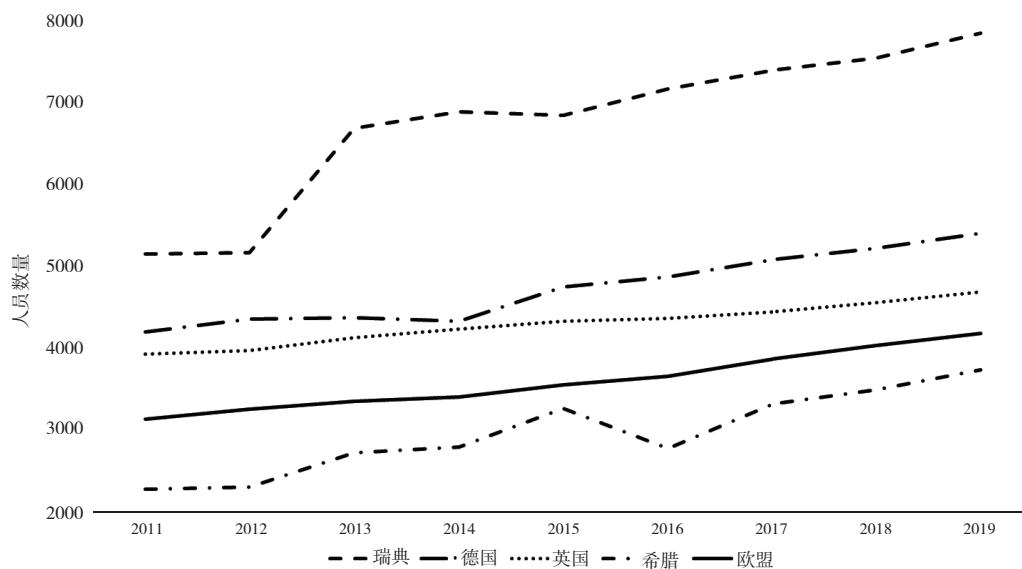


图8 2011—2019年瑞典、德国、英国、希腊与欧盟每百万人口研发人员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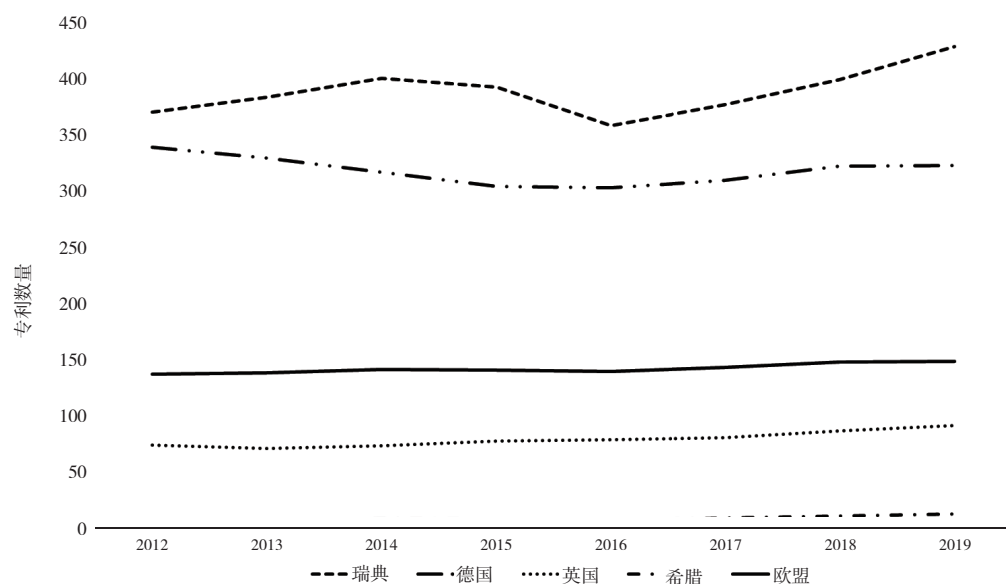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cn/>。

图9 2012—2019年瑞典、德国、英国、希腊与欧盟每百万人口申请专利数量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cn/>。

社会保障助力人力资本提升，促进研发和协助造就创新友好型氛围，而科研创新通过产业化，推动产业升级和提升生产效率。我们比较研究四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情况，结论很清晰，即社保制度和绩效好的瑞典等国，其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是最低国家（希腊）的2.47倍（见表11），一定程度上再次验证了上文阐述的作用逻辑。

表11 1995—2020年瑞典、德国、英国、希腊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国家	1995	2000	2005	2006	2010	2015	2020	1995—2020 平均值
瑞典	1.87	3.63	2.83	2.92	3.51	2.90	0.26	1.61
德国	1.51	2.48	1.58	1.60	2.31	0.51	0.38	1.09

国家	1995	2000	2005	2006	2010	2015	2020	1995—2020 平均值
英国	1.40	3.47	0.80	2.10	2.49	2.00	2.72	1.26
希腊	2.05	3.42	-2.84	4.28	-0.91	3.58	2.35	0.65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经合组织数据（<https://data.oecd.org/>）计算所得。受限于篇幅，此处仅展示每五年数据，平均值为 1995—2020 年每年增长率计算所得。

（五）社会保障和财政负担

持“社保拖累经济发展”观点的理由之一就是社会保障加重了财政负担，造成庞大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甚至酿成财务危机，直接拖累了经济发展。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欧债危机中以希腊为代表的“欧猪国家”。2009 年希腊公共债务占 GDP 比重为 135.5%，几近债务违约，其社保和福利制度支出备受诟病，俨然是主权债务危机的主因。那么，这是否是一个有着事实和数据支撑且具普适性的结论？

仍以四国为例，我们观察 1995 至 2020 年间的相关公共债务、政府财政以及社保支出等指标数值，可以发现：瑞典的社保总支出占 GDP 比重的年均值、政府社保支出占 GDP 比重的年均值是四国中最高的，分别为 27.0%、21.2%，但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即政府负债率）的年均值却是四国中最低的，仅为 63.7%。反观希腊，相关两支出指标均较低，在四国中位居第三位，分别为 21.4%、16.8%，但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年均值却是最高的，为瑞典的 2.2 倍之多（见表 12）。显然，事实和数据并不支持高社保支出、高政府社保投入必然导致政府高负债的指控和逻辑。且从政府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年均值这一指标来看，希腊政府投入于社保中的财政资源也只占 39%，远不及平均占 53% 的德国。德国不仅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保的比重为四国之首，且社保总投入、政府社保支出 GDP 占比均为次高，累积的公共债务却是四国中次低的。显然，随着一国社保支出的扩大，政府的财政负担和公共债务可能会加重，但是否一定会拖累经济发展无法一概而论，而是取决于社保筹资的来源性质、结构以及筹资方式，包括政府在其中承担的比重等，也与国家行政体制效率、公共债务构成、经济发展方式、驱动等诸多因素关联。一味指责社保总支出高或政府在社保中投入高，必然导致政府巨额财政赤字和沉重债务负担，造成经济衰退等，似并无坚实的事实数据支撑，也不符逻辑。

当然，从更为广义的财务负担来说，还有微观企业视角的用工成本。社保投入大、待遇好的国家确实用工成本高。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2019 年瑞典、德国、英国和希腊的每小时平均劳动力成本依次分别为 40.9、40、31.9 和 18.4 美元。^①但看其是否成为拖累经济发展的负担，主要是要看投入（社保等用工成本）和产出（实现的增加值）的效率（劳动生产率），而社保通过提升人力资本含量及创新氛围产生的正面影响前文已经有了论述和结论，这里同样适用。

①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计算所得，参见 https://www.ilo.org/shinyapps/bulkexplorer17/?lang=en&segment=indicator&id=LAC_4HRL_ECO_CUR_NB_A。

表 12 1995—2020 年瑞典、德国、英国、希腊社保和相关政府财政、债务指标年均数值 (%)

国家	一般政府债务总额占 GDP 比重年平均值	政府社保支出占 GDP 比重年平均值	政府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年平均值	社保支出占 GDP 比重年平均值
瑞典	63.7	21.2	34.1	27.0
德国	71.1	20.0	53.5	25.7
英国	78.9	15.0	31.9	19.8
希腊	140.6	16.8	39.0	21.4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所得；一般政府债务总额占 GDP 比重、政府社保支出占 GDP 比重数据来自经合组织 (<https://data.oecd.org/>)，社保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比重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https://www.imf.org/en/Data>)。

(六) 社会保障水平和经济发展适应性

从动态视角来看，讨论社会保障是否拖累经济发展，必然会涉及社会保障水平和经济发展程度相匹配和适应的问题。我们参考穆怀中、^①杨翠迎和何文炯^②的相关研究，用社会保障水平发展系数 CSS，即人均社保支出增长率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之比，来表示社会保障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反应程度。我们选取可得的数据，分别计算 1995 至 2017 年间四国各年的社保水平发展系数（见图 10），并按系数数值对应的状态进行年份计数（见表 13），主要观察三个方面：一是社保变动相对经济增长的最佳和基本适应频次，二是社保相对过度等不适应情况，三是社保变动的幅度。瑞典处于基本适应状态次数最多，社保和经济增长相互适应性最好，相对于经济发展而言社保过度的情况最少，匹配平稳性好（方差次小）。而反观希腊，虽然处于基本适应状态次数名列第二，但需注意其社保过度情况的年份极多，是瑞典的两倍有余，占整个样本期间的 47.8%，即希腊有约半数时间都存在社保与经济发展不匹配的问题。此外，希腊社保水平发展系数的方差达 38.5，分别是瑞典和德国的 9.4 倍和 6.9 倍，可见波动剧烈。再看居中的德、英国两国，几乎难分伯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欧债危机期间瑞典和德国的社保与经济的状况匹配程度较好，而希腊和英国的适应度波动较大。这说明前两国的社保制度及其未雨绸缪的制度改革使其能较从容地应对诸如欧债危机这样的外生冲击，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较好。

表 13 瑞典、德国、英国、希腊社会保障水平发展系数及分类

国家	CSS > 1 次数 (社保过度)	CSS=1 次数 (最适应)	0<CSS<1 次数 (基本适应)	CSS = 0 次数 (不适应)	CSS < 0 次数 (不适应)	1995—2017 年方差
瑞典	5	0	10	0	8	4.1
德国	9	0	6	0	8	5.6
英国	10	0	4	0	9	3.5
希腊	11	0	8	0	4	38.5

数据来源：作者依据经合组织人均社保支出数据 (<https://data.oecd.org/>)、世界银行人均 GDP 增长率数据 (<https://data.worldbank.org.cn/>) 计算所得。

① 穆怀中：《社会保障适度水平研究》，《经济研究》1997 年第 2 期。

② 杨翠迎、何文炯：《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04 年第 1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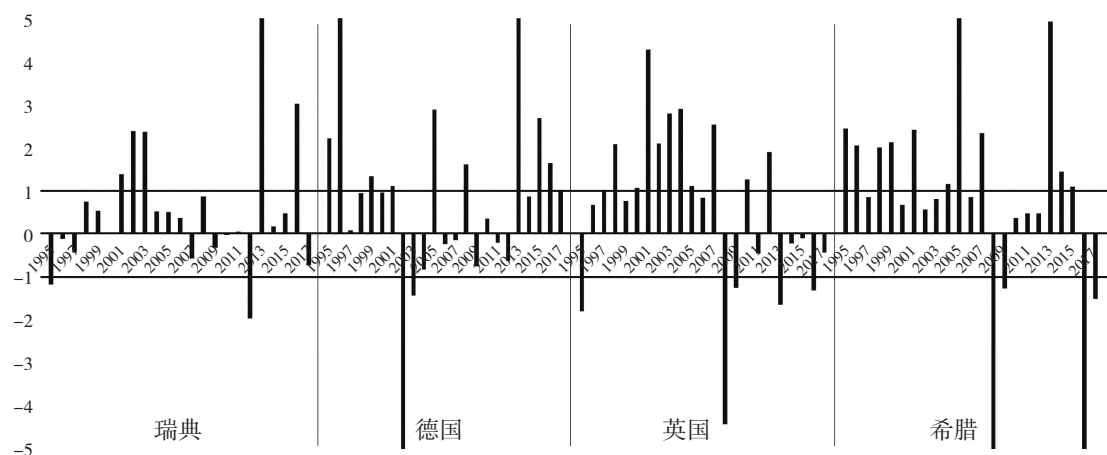


图 10 1995—2017 年瑞典、德国、英国、希腊社会保障水平发展系数

数据来源：作者依据经合组织人均社保支出数据（<https://data.oecd.org/>）、世界银行人均 GDP 增长率数据（<https://data.worldbank.org.cn/>）计算所得。有关社保发展系数的解释见杨翠迎、何文炯。^①

深入探究欧洲四国社保和经济发展适配性的表现，我们发现，其一，由于各国发展水平、社会条件、文化特征不同，制度模式不同，只要社保制度和经济发展相匹配适应就好，而不是单纯看其绝对的社保投入和待遇高低。按理来说，高税收、高福利的瑞典，极易出现高债务、劳动力市场僵化等弊端，其 20 世纪 70、80 年代也确曾出现过泛福利化。但瑞典相对透明和高效的治理体制、较为单一民族的人口构成、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和崇尚社会公平的共识，使民众较易接受高税收，同时高福利和教育投入降低了贫富差距，提升了人力资本水准，促进了创新，使科创推动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成为可能，有利于包容、灵巧和可持续增长，^②可支撑其高福利待遇，形成相对良性循环。而在希腊，尽管绝对社保投入不高，但较低的行政体制效率、失衡的经济结构、较低的劳动生产率、相对经济发展过度的社保投入，造成了债务负担，也拖累了经济发展。其二，相关国家是否及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的问题、挑战，对社保制度进行与时俱进的深刻改革，起了很大的决定作用。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随着全球经济局势的转变，欧洲国家社保制度均遭遇了空前的可持续问题，各国社保制度进入密集的改革期。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从“福利国家”向“竞争国家”转型的进程。我们聚焦改革相对深入、颇具结构性，且期间社保制度与经济适应和匹配程度较优的瑞典和德国，兼顾英国和希腊来剖析评价四国各自改革对其经济发展的适应情状。

以瑞典等为代表的北欧国家以高税收、高福利而闻名于世，其从“摇篮到坟墓”、包罗万象的福利制度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导致了政府巨大的财政压力，1980 年瑞典社保支出就已占 GDP 的 35.5%，政府财政支出猛增，税收占 GDP 的比重攀升到 50.4%，而经合组织平均为近

① 杨翠迎、何文炯：《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关系研究》，《公共管理学报》2004 年第 1 期。社会保障水平发展系数（CSS）=，（1） $CSS < 0$ ，两者呈反向变化，不适应状态；（2） $CSS = 0$ ，表明社保没有增长，经济增长与社会保障水平处于不适应状态；（3） $0 < CSS < 1$ 表明两者处于基本适应状态，（4） $CSS = 1$ 表明两者处于最佳适应状态， $CSS > 1$ 表明社会保障水平增长过度，且离 1 越远过度越重。

② 丁纯、陈飞：《主权债务危机中的欧洲社会保障制度的表现、成因与改革》，《欧洲研究》2012 年第 6 期。

38.8%。“泛福利化”和“养懒人”等过度保障现象出现,令高福利制度不可持续。^①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期,与其他北欧国家一样,瑞典遭遇了经济衰退,被迫开启了社保制度和福利国家的改革。改革旨在平衡预算、减少公共支出、降低税(费)率等,具体的改革举措涵盖养老、就业和医疗服务等诸多方面。养老保障改革包括延迟退休年龄、将现收现付制转变成现收现付与基金积累混合制、引入与收入关联的名义账户制、完善三支柱模式,同时实施退休越晚养老金越高的办法;^②在就业保障方面,欧债危机后瑞典将福利制度改革重点放在了降低社保缴费率和继续推进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方面,包括吸引和激励青年人就业等。^③医疗保障领域改革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提高服务效率(如引进DRG等)到末期转向医疗机构的企业化管理,再到21世纪的新一轮控费等;此外,对家庭津贴、教育津贴等各种福利津贴进行了调整。以上改革措施取得了不小的成果,较成功地遏制了福利支出的上涨。当然,也有学者指出,瑞典相关改革并没有改变福利国家的社保制度基础,也未达到政策设计者所期待用削弱国家福利的方法来刺激和鼓励非福利部门发展的目的。^④

德国这轮社保制度改革则带有一定程度的未雨绸缪性质。20世纪90年代,在老龄化、两德统一和社保制度的福利刚性等的冲击下,德国社保制度财政上的不可持续性日益凸显,1998年各社会保险分支的总缴费率达到42.1%的历史高点,^⑤政府财政负担也空前沉重;同时,经济全球化迫使严重依赖出口的德国经济必须控制成本持续上涨,也给不断膨胀的社保制度套上了紧箍咒。面对严峻局面,施罗德政府未雨绸缪,主动开启了社保制度的结构性改革,并被默克尔政府持续推进,这也为德国经济在欧债危机期间以及至今的“一枝独秀”奠定了基础。2003年3月,德国推出了包括社保改革在内的总体改革方案“2010议程”。对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劳动力市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养老制度改革包括延长法定退休年龄、通过引入人口因子等改变养老金计发方法以自动平衡收缴和支付、采用补贴等激励方法鼓励建立包括“里斯特养老金”等的第二、三层次养老保障;医疗保障改革则不满足于此前已有的开源节流、小修小补的思路,开启了以提高医疗机构间和医保机构间竞争力度为核心、以稳定缴费率目标的全面结构性改革。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以四个“哈尔茨法”为焦点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改革举措包括:打碎体制壁垒,降低解雇保护门槛;提倡灵活就业,鼓励自我创业;改革失业救济制度,合并失业和社会救济,缩短领取时间,引入强制就业原则,奖勤罚懒,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如联邦劳工局转制为有职介功能的联邦劳工署,强化职业介绍和培训等。这些改革举措在默克尔时期得以延续。这轮德国社保改革堪称卓有成效。^⑥尤其是劳动力市场改革造就了欧

① 丁建定:《瑞典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第152-153页。

② 财政部社会保障司:《瑞典社会保障制度概况》,《预算管理与会计》2014年第10期。

③ 谢琼:《超越左右:瑞典福利制度的调整及其影响因素》,《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④ 林卡:《北欧国家福利改革:政策实施成效及其制度背景制约》,《欧洲研究》2008年第3期。

⑤ 丁纯、李君杨:《未雨绸缪的德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5期。

⑥ 丁纯、瞿黔超:《金融危机对德国经济与社会的影响以及德国的对策》,《德国研究》2009年第2期。

债危机期间和其后的德国就业奇迹，^①也顺应了欧洲社保制度由“福利国家”向“竞争国家”转变的改革潮流。

英国福利制度的转折性改革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为摆脱“英国病”而以大肆私有化为特征的“撒切尔革命”，包括公房私有化、“内部市场”改革提升医疗服务效率、降低基本养老金标准、发展职业和私人养老金、压缩教育开支等；布莱尔政府的“第二代福利”思想则强调个人、社会和国家共同责任。经过私有化和多元化为特点的相关福利制度改革，英国福利制度从政府主导转向强调市场调节作用，政策由全民性转为选择性，从福利国家主义转向福利多元主义，从公民主张权利型转向权利责任对等关联型，^②使福利制度大体适应了经济情况的变化。

希腊较为实质性的社保改革发生在欧债危机期间，在负责处理欧债危机和对其纾困的欧央行、欧委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驾马车”的催逼下，希腊加速了包括养老金制度改革在内的社保体制改革，实施了包括推迟退休年龄、延长缴费年限、引进新的养老金计算方式从而降低养老金水平，以及整合碎片化的养老金体系等一系列实质性举措，^③以适应其紧缩财政开支的需求和庞大公共债务的经济状况。

综合上述对瑞、德、英、希四国在 1995 至 2020 年时间段内六个方面的具体分析，我们可得到明确结论：较高的社保投入和较完善的社保制度并非一定拖累经济发展，相反，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保制度可促进经济的长期持续、灵巧和包容性发展。

四、全体欧盟国家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

在前述对欧洲四大社会保障子模式的代表国家的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剖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社会保障总体来看有助于维护经济长期平稳发展，减轻经济衰退和危机的冲击，熨平波动；同时，对刺激消费、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和劳动力市场表现、助力科创研发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上，我们一方面把研究对象扩展到欧盟全体成员国（含英国，下同），另一方面，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更为普适和严谨的考察和验证。

（一）数据来源和变量定义

本文以欧盟全体成员国（含英国）作为研究对象，基于数据可得性和统计口径一致性考量，选取 1990—2019 年为样本时段。为深入探讨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者将欧盟统计局 Eurostat 数据库、世界银行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和 Education Statistics 数据库、

① 丁纯、李君杨：《试析欧债危机中的国际社会的表现——兼议德国模式的作用及其前景》，《欧洲研究》2014 年第 2 期；丁纯：《从希腊危机看后危机时代欧盟经济社会状况》，《求是》2010 年第 7 期。

② 蒋道霞：《1945 年至 2007 年英国社会福利保障政策的演进》，《产业与科技论坛》2017 年第 20 期。

③ 宋晓敏：《试析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希腊养老金制度的改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 年第 6 期。

OECD 数据库等多个国际数据库的资料予以整合。本文最关键的解释变量社会保障支出 (socialexpenditure_GDP) 指标来自 Eurostat 数据库, 该指标涵盖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多项支出, 并以社保支出占各国 GDP 总量的比值进行衡量, 为数据分析的横向比较提供良好基础。

对于被解释变量, 本文首先选取人均 GDP 刻画一国的总体经济发展状况,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为从不同视角检验社会保障对经济发展的效应, 本文进一步选取中学入学率与高等院校入学率对一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进行衡量, 以居民消费支出占 GDP 的比值与人均消费支出衡量一国消费水平, 并以一国居民申请的专利数目与该国居民和非居民申请专利总数衡量国家创新发展程度, 数据分别来源于世界银行 Education Statistics 数据库、WDI 数据库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

为考量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文进一步在分析中纳入劳动力市场条件、物价水平、经济开放度等作为控制变量, 具体变量定义和计算方式见表 14。劳动力市场方面, 借鉴蒙克和华冉的研究,^① 我们采用老年抚养比和劳动力参与率进行衡量。物价水平与居民消费、就业率息息相关, 本文采用按 GDP 平减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率来衡量。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关系到社保负担, 也影响国家产业分布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态势。经济开放度采用贸易进出口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净额来衡量。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5。从表中可知, 欧盟国家平均社保支出占 GDP 比值为 22.65%, 最高可达 35.6%, 体现了欧盟总体的高福利特征。1990—2019 年间, 中学入学率和高等院校入学率平均值为 104% 和 52%, 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73% 和 30%, 这反映欧盟国家对教育的重视以及较好的人力资本积累。欧盟全体成员国的老龄人口占工作年龄人口平均比值为 23.61%, 同期世界平均老年抚养比仅为 11.36%, 因此欧盟全体成员国有较强的需求持续改善社保体制, 以缓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欧盟全体成员国的基尼系数均值为 0.31, 收入分配较为平均。

表 14 相关变量定义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参数设定
lnGDPpc	人均 GDP	人均 GDP 指标, 取对数形式
socialexpenditure_GDP	社会保障支出	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的比值 (%)
School enrollment_secondary	中学入学率	中学入学人数(不论年龄)占中学适龄人口的比例 (%)
School enrollment_tertiary	高等院校入学率	高等院校入学人数(不论年龄)占高等教育适龄人口的比例 (%)
Consumption_GDP	居民消费支出	居民消费支出占 GDP 的比值 (%)
lnConsumption_pc	人均消费支出	人均消费支出指标, 取对数形式

① 蒙克、华冉:《社保负担与经济发展:来自战后全球经济增长的证据》,《公共管理评论》2018 年第 3 期。

ln_patent	居民专利申请数目	本国居民申请专利数目，取对数形式
ln_totalpatent	专利申请总数	居民和非居民申请专利总数，取对数形式
Urbanrate	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Inflation	通货膨胀率	按 GDP 平减指数衡量的通货膨胀（%）
oldage_dependence ratio	老年抚养比	老年人口占工作年龄人口的百分比（%）
labor participation	劳动力参与率	劳动人口占 15 岁以上总人口的百分比（%）
ln_export	出口贸易	货物出口总值，取对数形式
ln_import	进口贸易	货物进口总值，取对数形式
ln_FDI	对外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净额，取对数形式
Gini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

表 15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人均 GDP	821	9.79	9.99	0.92	7.01	11.69
社会保障支出	680	22.65	22.70	6.03	0.00	35.60
中学入学率	787	103.98	100.82	16.55	59.85	163.93
高等院校入学率	766	52.76	54.11	21.86	4.79	142.85
居民消费支出	816	75.92	76.32	7.78	42.37	92.35
人均消费支出	816	9.88	9.76	1.60	1.08	15.02
居民申请专利数目	732	6.58	6.64	2.04	1.10	10.85
专利申请总数	729	7.06	7.14	1.87	1.39	11.13
城镇化率	840	71.49	70.03	12.28	47.91	98.04
通货膨胀率	809	7.40	2.35	37.62	-9.73	914.1
老年抚养比	840	23.61	23.38	4.63	15.16	36.06
劳动参与率	840	69.95	70.27	5.65	57.10	83.99
出口	770	24.43	24.58	1.79	19.95	28.06
进口	770	24.59	24.71	1.60	20.13	27.86
对外直接投资	278	22.64	23.05	2.23	0.00	25.81
基尼系数	444	0.314	0.314	0.038	0.207	0.406

（二）模型构建

1. 社保支出影响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总效应模型

参考现有文献，本文构建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社保支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具体

模型设计如下：

$$\ln GDP_{pcit} = \alpha_0 + \beta_1 Social_{expenditure_GDP}_{it} + \beta_2 Country_Control_{it} + \delta_i + \theta_t + \varepsilon_{it}, \# \quad (1)$$

$$Gini_{it} = \alpha_0 + \beta_1 Social_{expenditure_GDP}_{it} + \beta_2 Country_Control_{it} + \delta_i + \theta_t + \varepsilon_{it}, \# \quad (2)$$

上式中下标 i 代表国家，下标 t 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分别为每年的各国人均 GDP 和基尼系数，关键解释变量为社保总支出占 GDP 的比重。 $Country_control_{it}$ 表示一系列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城镇化率、老年抚养比、劳动力参与率、贸易进出口、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和通货膨胀率。 δ_i 为国家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国家层面固有特征； θ_t 为年份固定效应，用于控制年度间全球宏观经济、政治形势变化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ε_i 为残差项。

2. 社保支出影响宏观经济不同构成的模型

基于第二部分关于社会保障对劳动力市场、消费以及创新的影响机制的探讨，本部分依次构建回归模型进行检验，具体如下所示：

$$School_enrollment_{it} = \alpha_0 + \beta_1 Social_{expenditure_GDP}_{it} + \beta_2 Country_Control_{it} + \delta_i + \theta_t + \varepsilon_{it}, \# \quad (3)$$

$$Consumption_{it} = \alpha_0 + \beta_1 Social_{expenditure_GDP}_{it} + \beta_2 Country_Control_{it} + \delta_i + \theta_t + \varepsilon_{it}, \# \quad (4)$$

$$\ln_Patent_{it} = \alpha_0 + \beta_1 Social_{expenditure_GDP}_{it} + \beta_2 Country_Control_{it} + \delta_i + \theta_t + \varepsilon_{it}, \# \quad (5)$$

模型（3）中的被解释变量为中学入学率和高等院校入学率，模型（4）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居民消费总支出占 GDP 的比值和人均消费支出，模型（5）的被解释变量为每年该国居民申请的专利数和该国居民与非居民申请的专利总数。控制变量的设计与模型（1）中保持一致，并纳入国家和年份固定效应。

（三）实证结果分析

1. 社会保障与经济总效应的分析

表 16 的第（1）列汇报了社保支出与人均 GDP 的 OLS 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与传统观点认为过高的社保支出会拖累经济发展不同，本文基于欧盟样本发现，社保支出和人均 GDP 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估计系数在 1% 的水平上保持显著。为排除其他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第（2）列中加入了诸多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并纳入国家和年份固定效应，可以看到两者之间虽然未持续保持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回归结果并未显示增加社保支出会显著降低经济发展水平。控制变量方面，老年抚养比和通货膨胀率对经济发展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表明社会老龄化程度上升不利于经济增长。贸易进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可推动经济发展水平上升，这说明欧盟整体经济发展对自由贸易和经济开放度的依存度较高。

为进一步展示社会保障可通过收入二次分配的功能降低收入差距、减少社会摩擦从而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表 16 的第（3）列和第（4）列汇报了社保支出与基尼系数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社保支出显著降低了欧盟全体成员国的基尼系数，这说明社会保障可缩小居民收入

差距、促进社会再分配功能的实现。总体来说，表 16 的结果表明欧盟全体成员国的社保支出对经济发展并不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

表 16 社保支出与经济发展、贫富差距

	人均 GDP		基尼系数	
	(1)	(2)	(3)	(4)
社会保障支出	0.0820***	-0.0049	-0.2247***	-0.3556***
	(0.0036)	(0.0030)	(0.0299)	(0.0973)
城镇化率		0.0024		-0.1069
		(0.0024)		(0.1014)
通货膨胀率		-0.0088***		-0.1066
		(0.0033)		(0.0961)
老年抚养比		-0.0196***		0.1143
		(0.0027)		(0.0866)
劳动参与率		-0.0002		-0.0512
		(0.0025)		(0.0894)
出口		-0.1523***		3.4220***
		(0.0454)		(1.2544)
进口		0.7532***		-5.1318***
		(0.0631)		(1.7600)
对外直接投资		0.0083**		0.0495
		(0.0033)		(0.0865)
国家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观测值	680	260	431	174
调整后的 R 方	0.427	0.988	0.115	0.915

注：括号里是标准差。*、**、*** 分别代表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2. 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本、居民消费和国家创新的效应分析

表 17 以各国的中学入学率和高等院校入学率作为人力资本水平的衡量指标，将其分别与社保支出联系进行回归分析。在仅控制国家和年份固定效应的情况下，第（1）列和第（3）列的估计结果显示，社保支出的增加显著提高了中学入学率和高等院校入学率，社保支出占 GDP 的比值每上升 1 个百分点，中学入学率上升 0.27 个百分点。第（2）列和第（4）列加入了控制变量的影响因素，中学入学率的回归结果中社保支出的估计系数为正但不显著，高等院校入学

率的回归结果中社保支出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这表明社会保障对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主要体现于高等教育人口的增加。控制变量方面,与经济发展总效应的估计结果类似,经济开放度特别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上升,可提高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但通货膨胀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会抑制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总体而言,表17的结果表明,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可影响居民对子女的教育支出,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为现有文献中的利他动机提供了经验证据。^①

表17 社保支出与人力资本水平

	中学入学率		高等院校入学率	
	(1)	(2)	(3)	(4)
社会保障支出	0.2721**	0.4317	0.3505**	0.8719**
	(0.1350)	(0.4996)	(0.1609)	(0.3842)
城镇化率		-0.0761		-0.1601
		(0.4116)		(0.3092)
通货膨胀率		-0.7597		-0.7647*
		(0.5386)		(0.4040)
老年抚养比		1.3475***		0.2332
		(0.4480)		(0.3762)
劳动参与率		0.4125		-0.8136***
		(0.4102)		(0.3099)
出口		-16.2921**		41.2924***
		(7.4740)		(5.7613)
进口		17.9507*		-2.1162
		(10.3930)		(8.2730)
对外直接投资		1.0122*		1.3166***
		(0.5693)		(0.4480)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641	249	614	230
调整后的R方	0.812	0.759	0.819	0.892

注:括号里是标准差。*、**、***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表18的前两列汇报了社保支出对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值的影响效应。估计结果显示,不论是否控制国家层面的影响因素,社会保障可显著拉动居民消费支出。社保支出每上升1个

① Gary S. Becker, Kevin M. Murphy, "The Family and the State," *The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1988, 31(1).

百分点，居民消费支出占 GDP 的比值上升 0.6 个百分点。第（3）和（4）列采用人均消费支出作为居民消费水平的替代指标，结果显示社保支出对人均消费支出产生的积极效应相对有限。综合两个指标的实证检验结果，本文认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保支出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内需不足的问题，可通过潜在的拉动内需这一渠道推动经济发展。

表 18 社保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

	居民消费支出		人均消费支出	
	(1)	(2)	(3)	(4)
社会保障支出	0.6327***	0.6271***	-0.0032	-0.0023
	(0.0487)	(0.0798)	(0.0032)	(0.0026)
城镇化率		-0.0610		0.0045**
		(0.0625)		(0.0021)
通货膨胀率		-0.1876**		-0.0011
		(0.0878)		(0.0029)
老年抚养比		0.2766***		-0.0141***
		(0.0727)		(0.0024)
劳动参与率		0.1544**		0.0031
		(0.0656)		(0.0022)
出口		-10.0572***		-0.3362***
		(1.2035)		(0.0395)
进口		-1.3089		0.4992***
		(1.6716)		(0.0549)
对外直接投资		-0.0725		0.0058**
		(0.0880)		(0.0029)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是	260	680	260
调整后的 R 方	0.895	0.971	0.983	0.998

注：括号里是标准差。*、**、*** 分别代表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表 19 以本国居民申请的专利数目与本国居民和非居民申请专利总数作为国家创新水平的衡量指标，考察社会保障与创新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社保支出占 GDP 的比例上升，该国的专利申请数目显著上升。由第（2）列和第（4）列进一步得出，社会老龄化对创新存在抑制作用，但劳动力参与程度的提高可推动创新，在控制了这些国家层面影响因素后，可以看到社会保障依然对创新发展程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表明，社会保障制度可改善劳动者的福利

水平,提高其工作的积极性,进而产生激励创新的效应。

表 19 社保支出与国家创新水平

	本国居民申请专利数目		专利申请总数	
	(1)	(2)	(3)	(4)
社会保障支出	0.0215***	0.0672***	0.0483***	0.0798***
	(0.0066)	(0.0162)	(0.0097)	(0.0184)
城镇化率		0.0046		-0.0037
		(0.0127)		(0.0142)
通货膨胀率		0.0270		0.0364*
		(0.0178)		(0.0200)
老年抚养比		-0.0709***		-0.0851***
		(0.0144)		(0.0162)
劳动参与率		0.0260*		0.0352**
		(0.0134)		(0.0151)
出口		1.0960***		1.2230***
		(0.2473)		(0.2780)
进口		-0.2685		-0.2285
		(0.3273)		(0.3710)
对外直接投资		0.0340*		0.0268
		(0.0181)		(0.0205)
国家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605	240	603	239
调整后的 R 方	0.976	0.985	0.940	0.979

注:括号里是标准差。*、**、*** 分别代表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

综上,实证结果表明:社会保障并未对总体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负面效应,社保支出可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拉动居民消费和促进创新产出,同时缩小国民收入差距实现再分配功能,从而促进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

五、欧洲经验和对中国的启示

首先,由于各国的发展阶段和水平、治国理念、经济与社会结构、民众文化与习俗、行政效率等要素禀赋的异质性,没有可以完全照搬和全盘模仿的社保体制模式。欧洲各国社保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深深打上各自烙印,社保制度是促进还是拖累经济发展,没有绝对定论,只有合适的才是最好的。强调责任权利对等和社会对话、兼顾效率公平且未雨绸缪主动改革的德国,高投入、高保障、全覆盖但着力以社保促进人力资本提升和创新,且因势利导改革“泛

福利化”的瑞典，不断进行福利私有化、多元化改革但贫富差距、社会排斥大的英国，以及社保绝对投入不高但相对过度而拖累经济发展的希腊，为我们提供了社保和经济之间相互适应或排斥的不同经验和教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要注重和学习借鉴国外社会保障有益经验，但不照搬照抄，简单复制，而是立足国情，积极探索，大胆创新。^①

其次，欧洲的实践还启示我们，社会保障制度和经济体制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相互依存、互相作用的两大重要制度安排和组成部分。社保和经济发展必须互相配合，才能相得益彰，也即相互的适应性非常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是水涨船高的关系，水浅行小舟，水深走大船”。^②两者适应性好，则经济增长也快，质量亦高，社会内部冲突、张力也小，积极与时俱进地进行社保改革的德国和瑞典的实践就是最好的案例。我们要基于自身的条件和发展阶段，根据时代发展的方向和特征，努力使社保的投入、保障的水平既体现社会公平性，又符合经济发展的需求。努力将两者关系控制在相互适应或基本适应区域，既不能使社保安排持续落后于经济发展，以致延宕民生的提升、社会的进步，也要防止出现长期严重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过度社保投入和泛福利化，以致拖累经济发展，进而导致社保自身发展成为无源之水，像希腊那样不可持续。

再则，欧洲国家这一阶段社保制度的发展转型及其各自不同的表现提示我们，随着世界经济进入有着逆全球化紊流的全球化时代，加之老龄化压力叠加数字化、人工智能冲击，各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进入了新时期。尽管依据各国经济和社保制度发展阶段不同，各自社保发展、改革和完善的重点任务会展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但参与全球经济大循环的各国，社保制度无一例外地要面对时代转型的压力和挑战。即社保的发展，既要应对社会成员的年老、疾病、失业、工伤、失能、生育等风险，消除贫困，通过再分配增进和实现社会公正，助力经济包容和可持续增长，又要满足经济全球化、老龄化和数字化冲击下总体经济竞争力维持和提升的要求，满足对社保体制的效率和与经济发展适应性的要求。社保制度迎合时代要求越迅速越到位，其与经济发展的契合度就越高，这一战略性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在确定社保体制发展方向和重点时加以重视和汲取。

此外，鉴于这一时期欧洲相关国家社保在提升人力资本存量、配合国民经济发展、适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以科技竞争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中的重要作用，我国应在完成全面社保体系的构建和基本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以后，与时俱进、及时和适度地拓展社会福利领域并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尤其是迎合经济全球化、以科技竞争为核心的经济竞争和发展要求，强化社保政策中有关教育等提高人力资本含量的内容，制定和实施更多科创友好型、家庭友好型的社会政策，以此积累高人力资本存量，夯实创新基础和营造创新氛围，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包容、可持续发展的社保和经济良性互动的模式。

① 习近平：《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求是》2022年第8期。

② 习近平：《促进我国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求是》2022年第8期。

最后,欧洲国家的改革经验和教训还提醒我们,要避免重蹈欧洲福利国家走过的弯路,不要泛福利化,要建立与我国发展阶段、国情相适应的社保制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发展、完善社保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需求,营造适应灵巧、包容和可持续增长的氛围;另一方面,要未雨绸缪,考虑福利刚性和道德风险,不能在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搞泛福利化,不能像欧洲福利国家那样遇阻后再走回头路,遗留后患。同时,要不断根据世界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状况及时对社保制度做出适应性改革,使两者相容互长。

Soci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and Lessons from Europe

Ding Chun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o study whet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encumbered by social securit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Europe's social security from "welfare state" to "competitive state" and examines the representative countries of four sub-models of Europe'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namely Sweden, Germany, the UK and Gree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ong-term macroeconomic development, consumption, labor marke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fiscal burden, and the adaptability of social security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Moreover, based on the data of all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cluding the UK),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social security facilitates stable and long-run economic growth, stimulates consumption and jobs, helps to accumulate human capital and promotes innovation. Thus, it cannot be concluded that social security necessarily hinders economic development. Lastly, this paper provides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al security. China's social security should be based on China's unique context, keep pace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perly cope with emerging challenges and need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role of social security i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avoid the dilemma caused by excessive welfare as in some European countries.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security; EU countries; adaptability; empirical analysis

(责任编辑:华颖)